

“在习总书记支持下，福州的科技事业起飞了”

——习近平在福州（九）



采访对象：高翔，1943年7月生，福州人，民盟成员。196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在福州市第二中学任教。1988年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1991年任市长助理，1992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7年任副市长，2003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7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高市长，您好！您在福州市教委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您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高翔：我第一次见到习总书记是1990年4月，那时他刚到福州市委书记一个多月。当时我也刚告别一所高中的教师岗位，到福州市教委任副主任。教委领导派我跟随习总书记到福州各个县调研。调研过程中，我和习总书记没有单独谈过话，但我一直在留意这位新书记的工作方法。

习总书记专门到乡下最贫困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到基层单位，到小学，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家里走访。一开始他就是看，和群众交流，不听当地领导的汇报，等到了一个个点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才开始听汇报，并结合看到的、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来对照汇报的情况。真实情况该怎样就是怎样，他一清二楚，谁也蒙不了他。他有着独特的、认真细致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整个过程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由外及里，由表象到本质，通过这个过程找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习总书记开会的过程，也非常讲求实效。念念稿、走个过场这种事在他的会上是不存在的，他不仅以自己调查研究所看到的情况来分析问题，还要请与会者说出各自的看法，指出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如何落实解决问题等等。习总书记当时就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我们做工作要抓关键环节，就如同牵牛要牵牛鼻子一样。”这句话当时给我触动很大，我是插过队的知青，知道一头牛有上千斤的分量，牛脾气又很犟，你推也推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牵着牛鼻子，它才能乖乖地跟你走。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也是这样，总是要通过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那些关键问题，找到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工作才能有实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注重调研、讲求科学方法的特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对您后来的工作是否有帮助和启发呢？

高翔：那肯定是有很大帮助和启发作用的。在习总书记来福州之前，我刚刚从教师身份转变为干部，担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巨大转变让我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工作上的困难和阻力也让我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领导岗位，内心深处希望能返回讲台，继续当让自己得心应手的教师。但是，自从跟随习总书记下乡调研以后，我从中得到很大启发。当时我心里想：我现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发愁这个工作推动不

下去，那个工作开展不起来，还不如到学校去，到乡镇基层去，自己去看，去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当时，职业学校的招生、教学、学生就业都在我分管负责的工作范围内。我走了好几个学校，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出路，这也是职业教育和社会需求如何挂钩的问题。我借鉴了习总书记善于在同类工作中寻找共性，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牵住“牛鼻子”，如同治病要治本，除草要拔根，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被动解决问题。于是，我围绕这个问题跟各个学校的校长一起调查，一起研究，从教学上、制度上研究提出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挂钩的种种举措，加强用人单位与职业学校的沟通，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工作。这样一来，以后的工作就越来越顺畅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农村的小学教学工作非常涣散。很多村里的学校都人去校空，尤其是偏僻的小学，学生寥寥无几，不少学校教师包教“语、数、音、体、画”，也有不少教师辞职改行的。当时，我跟随习总书记下乡调研，到了福清，当时是一个中上等发展水平的县，不少村办小学也办得零零落落。习总书记问我，农村小学这种状况，教委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因为之前调研过，回答还是比较有底气的，我说：习总书记，我之前也走了几个县几个村，初步考虑把村与村之间办得不景气的小学合并，合并之后，经费集中使用，校舍、宿舍和食堂都可以办起来，让师资力量集中起来，乡镇和县里面整合各村的小学到中心校，也整合原来县和村给学校的拨款，集中办学，提高效率和质量。习总书记当时就在调研会上肯定了我这个思路。

后来，全市农村教育就按照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有了“强弱联办”“强弱联办”的模式，还安排优秀教师定期支教，各村的小学办学都逐渐有了起色。习总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也不断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政策措施等各方面给全省各地的基础教育提供支持。那时我已经在福州市政府工作了，在省、市全力支持下，贫困乡村的小学里面逐渐办起了食堂，伙食还不错，宿舍也干净整洁。后来，这样的农村小学在福建省各县（市）很普遍，效果也都很好。习总书记到省内各地视察，看到农村基础教育有了可喜变化，非常高兴。

采访组：您于1991年担任市长助理，接触大量政府工作，从那时起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打交道就更多了吧？

高翔：是的。1991年，我到福州市政府当市长助理，同时我还担任民盟福州市主委。那

时候，市委书记和副书记要和民主党派结对子、交朋友，我和致公党的一个主委黄双月就跟习总书记“结对子”、交朋友。这个朋友可不只是名义上的，习总书记经常找我们谈话，认真了解听取民主党派的工作情况及意见建议。我那时还担任了民盟省委会的副主委，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会议和专题研讨，习总书记都亲自参加并讲话。

当时，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经常要列席市委常委会，领导同志们经常就一些议题热烈讨论，各谈各的意见，内容交错复杂。每次习总书记听完作最后总结时，他都把这些事情融合起来，通盘考虑，指出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中的难点在哪里，从哪项工作开始切入……他是常委会名副其实的“主心骨”，每次他一讲完，与会的同志都心服口服。

1997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已经到省里当省委副书记了，我那一年任福州市副市长，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福州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作为分管科技的副市长，对福州在科技方面如何发展很焦急。我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就找到我的同乡、一位著名学者请教。我对他说，我现在当副市长，最苦恼的就是科技发展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指点？他说，你赶快去申报软件园，国家目前只批10个，现在已经批到第7个了。将来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要靠科技来推动，而软件产业的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回福州以后赶快查资料，又组织科委和政府办公厅一起研究，确定福州必须走这条路，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之后我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市长办公会，又送到市委办公会。市委常委会上，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些人表示不支持：福州在没有科技产业的条件下发展软件业，这简直是想一口吃个胖子，一步登天。

我当然不信这个邪。习总书记说过，考虑好了的事情就要决定，就要坚持做好，不要半途而废。幸运的是，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我市要争取这个软件园项目。”那段时间，我长期跑科技部，竭尽全力要把这件事情落实下来。但是，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虽然每月跑两趟科技部，但我在北京两眼一抹黑，既不认识科技部的领导，也没有熟人，进退两难，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我自己的成败与否倒是小事，但该做的事情做不好，辜负了政府对我的信任，辜负了民主党派对我的推荐，我又如何交代得下去呢？

有一天，我在福州市政府正为申报软件园

的事情发愁。习总书记的秘书从省委来市政府找我了，他说：高副市长，你在跑科技部批软件园啊？我无奈地说，是啊，跑不下来，连办公室主任都不见我。习总书记的秘书笑了笑说：你直接去科技部找部长吧，给你联系好了。我的心激动得“扑通扑通”的，当时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答应着：好的，好的，我马上到北京。

接下来，福州市申报软件园的事情就进展得很顺利了。记得在一次有关科技的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只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大胆去试验。”以后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尚方宝剑”，再有消极退缩的论调，我就拿出这句话来说服自己，也说服对方。

习总书记鼓励我们大胆干、勇敢闯，让我们做事要往大处想、高处想，他到省里工作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软件园建成之后，为了提高软件技术人员的水平，福州市在软件园内设了一个研究生班。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在清华、北大工作的福州老乡的帮助，请了这两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定期来福州上课。同时，省政府也十分支持福州市在琅岐岛开展“清华北大筏艇赛”，为了给软件园吸引人才、扩大影响，我们租了2辆汽车，把这些科技人才从琅岐岛拉到软件园去参观，希望他们毕业后能来福州工作。在省、市的支持下，两校筏艇赛举办了四届，省里还拨了经费支持我们。那几年，习总书记在省里多次接见清华、北大等高校来福州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感谢他们对福建人才培养及科技发展的支持。

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当时习总书记接见清华领导时，我也在场，我听到习总书记跟清华的领导“商借”一位人才来福州大学担任校长。后来，这件事情办成了，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吴敏生到福州大学来担任了多年的校长。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您当时在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和他在一套班子里工作。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对人大工作的创新及具体举措。

高翔：习总书记始终很重视人大工作。在他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前，人大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重要作用，当时民间有句话讽刺说：“市委定调，政府干活；人大举手，政协聚餐。”虽然有点儿偏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习总书记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把人大的工作提到很高的位置，1994年，他在人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发挥人大在福州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习总书记在市委会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凸显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

习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比如，对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他亲自与文物局局长曾意丹去现场调研并指示：“要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不久，在他的领导下，福州市人大在全国率先出台《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习总书记主持人大工作以后，所有立法工作都要通过法制创新课题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来，习总书记要求定期研究人大的工作制度，加强法律监督管理。从此以后，人大真正成为稳定福州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采访组：您任福州市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文化工作方面都给了您哪些具体支持？

高翔：我任福州市副市长的时候，分管文化工作，文艺演出是文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我调查了福州市的闽剧团，发现团里的演员老化严重，都演不动了。我一看，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闽剧没有后来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保留下去，如何留给后人呢？后来，在习总书记的支持下，福州市把闽剧学校从省艺术学校“分离”出来，由市里独立办一所闽剧学校，让年轻人学习这门传统艺术，让闽剧后继有人。现在这个戏校还在办，这门艺术不仅得到传承，而且得到丰富发展。

当时，福州市歌舞剧院，主要招收了一些民间演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办演出，专业性不够，效果也比较差。在习总书记支持下，市里拨款在北京舞蹈学院专门办了一个“福州班”，送了12名11岁左右的小演员赴京学习舞蹈艺术。现在这些人都成了福州市艺术界的主力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他和家人都生活简朴，待人真诚，和市民结下深厚友谊。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小故事与我们分享？

高翔：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一直住在市区一个狭窄的小巷子里。他住的那栋楼比较老旧，房间面积也小，远没达到他的级别应当达到的标准。市委后来有了条件更好的房子，习总书记也没从这栋小楼搬走，一直住在这个小巷子里。那个地方是福州最普通的市民老百姓生活聚居的场所，很接“地气”。附近老百姓也都知道，市委书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住在自己身边。

彭丽媛同志生小孩以后，仍然在这个地方生活。孩子出生以后，彭丽媛同志的母亲来福州帮忙带孩子。习总书记平时生活很简朴，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小孩子穿的衣服，她们不买高档的，只到楼下一个小裁缝店去做，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做一件衣服。

那个裁缝店很简陋，当时就跟一间报刊亭差不多大。店主是个福州长乐县来的农村女孩，她爱人是福州园林局工人，小两口都是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由于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回宿舍都经过这家小店，她们之间就成为了朋友。彭丽媛同志每路过这家小店，都会亲切地和女孩打招呼。夏天天热的时候，彭丽媛同志的母亲经常抱着小外孙女，在小店里坐一会儿，和女店主拉拉家常。

习总书记离开福州的时候，彭丽媛同志的母亲还专门到这家裁缝店去道别，她说：我们一家要搬走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照。女店主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说，老人家，你一直照顾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呀。女店主后来跟许多人都说起这件事，舍不得他们搬走。

习总书记一家人待人诚恳热情，谦逊随和，在左邻右舍老百姓中的口碑非常好。直到今天，那里的人们还对他们一家念念不忘。

2002年，习总书记离开福建的时候，大家欢送他、与他合影留念，我当时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欢送和合影，心里难过极了。习总书记到浙江以后，他的秘书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市长，习总书记向你问好。然后，习总书记还接过电话，对我说：“高翔啊，你以后到浙江来，跟我招呼一声。”我心里很激动，我说：“好的，好的，习总书记，谢谢您！”

时光荏苒，一转眼10多年又过去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越繁荣富强，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这些老部下大多已经退休了，但谈起习总书记大家都是赞不绝口。我们衷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的同时，注意保重身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上接1版头条）要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进一步强化各级党委在宣传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和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专门职能，加强对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有效提高对宣传工作的保障监督，推动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本、创作为基、改革为先、创新为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力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推出更多富有历史底蕴、充满时代气息、散发泥土芬芳的优秀作品，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解决好文化供给不对路不精准、城乡文化资源投放不平衡、文化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及相关产业融合不紧密等问题，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积极构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育人”工作体系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鲜明要求，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大使命，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基础工程。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永葆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新人。只要一代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加强学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把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团结凝聚起来。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使科学理论全面融入教育教学之中。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使各类课程、各项管理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协同效应，并不断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找准思想理论教育和学生兴趣的共鸣点，融入式深入式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组织开展针对性强实效性强的实践活动。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突出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建设适应新时代教育教学职责使命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加快构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地压实的“安全”工作体系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必须建立和强化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必须构建好责任制落地压实的“安全”工作体系，切实维护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不仅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

重大问题，也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宣传思想战线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建工作责任制、党政领导班子及单位绩效考核中的重要地位，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工作一同部署一同落实。进一步加强各类阵地管理，全面落实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尤其要加强网络阵地建设和管理，使各类意识形态阵地成为传播各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牢固阵地。完善健全意识形态工作巡视巡察、联席会议等相关制度，让制度发威、让责任见效，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守土尽责、守土有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学员，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